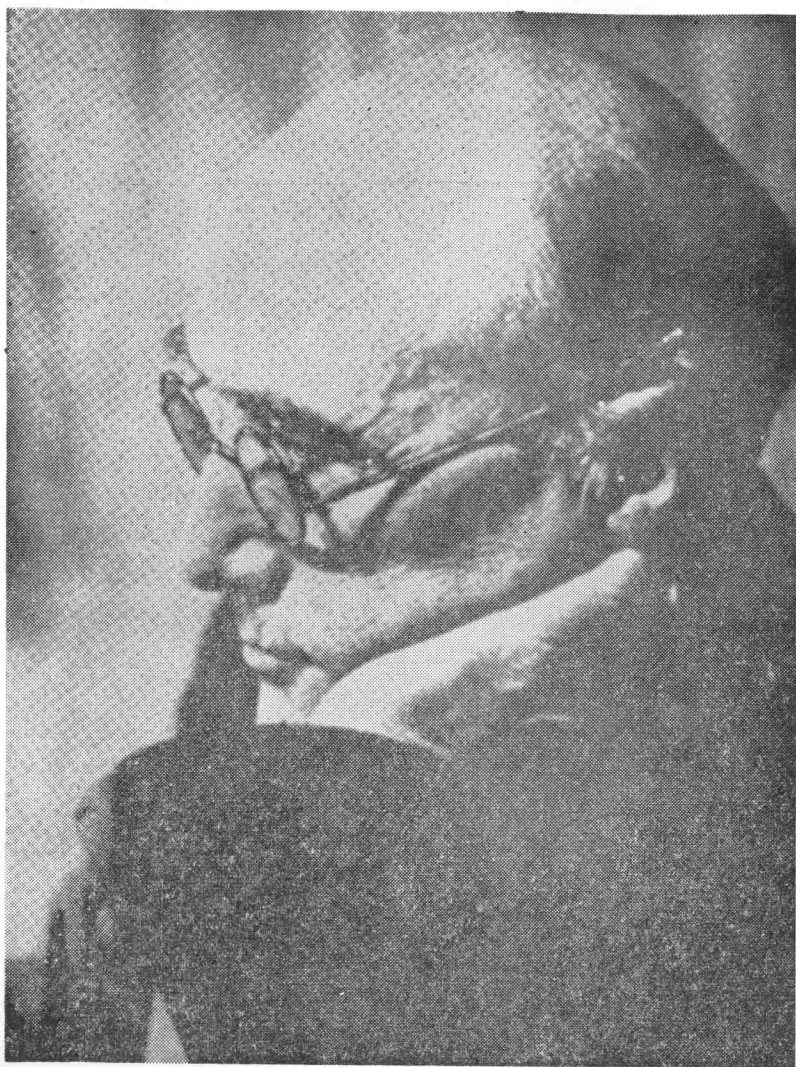




紀德評傳

華萊士·伐利著
楊 澤譯



法國文學家紀德 (André Gide, 1869-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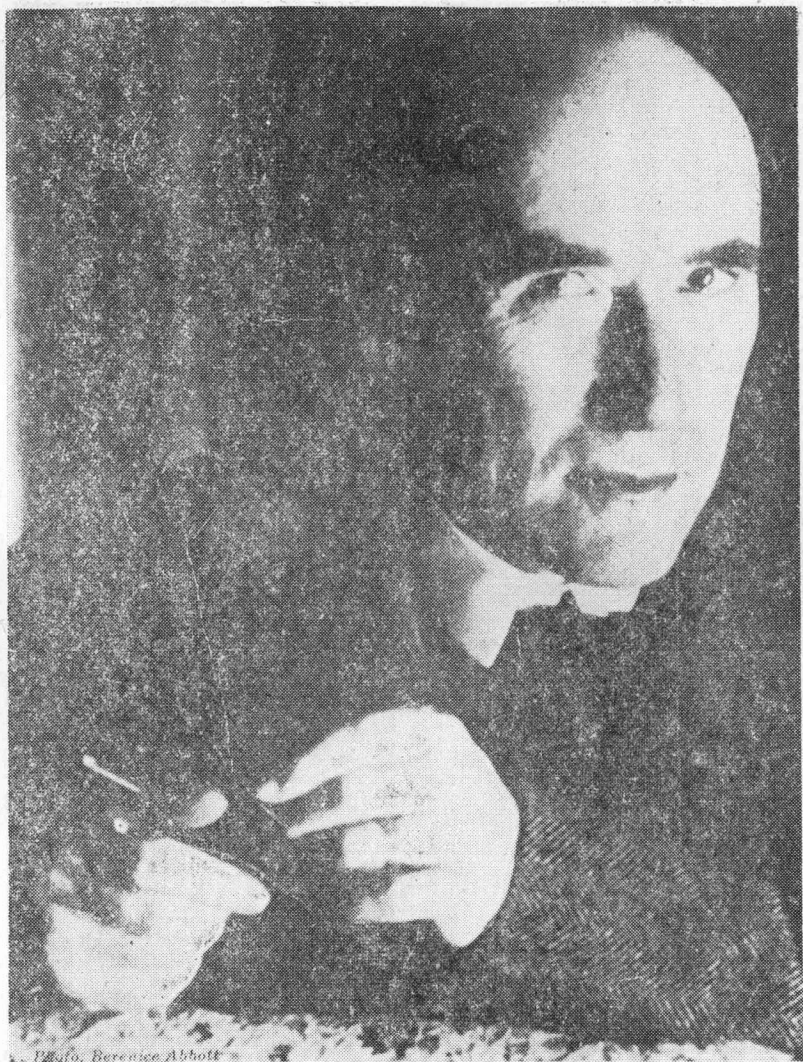


Photo. Berenice Abbott

目次

- 1、序言•5
- 2、童年與青年：一八六九——一八九一•17
- 3、從馬拉美到非洲：一八九一——一八九五（沼澤）•29
- 4、最初的追求：一八九七（地糧）•49
- 5、「背德者」（一九〇二）和自由的問題•63
- 6、浪子與聖者：浪子回家（一九〇七）和窄門（一九〇九）•77
- 7、無因的行動：梵諦岡地窖（一九一四）•91
- 8、故事（récit）的藝術：田園交響樂（一九一九）•103
- 9、小說藝術：偽幣製造者（一九二五）•115
- 10、一九二五——一九四五•133

- 11、英雄神話：伊迪普（一九三一）與德賽（一九四六）• 145
- 12、紀德的逝世：一九五一——一九五三• 163
- 13、日記與自傳• 179
- 14、紀德的婚姻• 195
- 15、紀德與天主教• 209
- 16、紀德與作家的職業• 229
- 17、今日的紀德• 243
- 譯者後記• 267
- 附錄
- 1、參考書目• 269
- 2、紀德年表• 277

1 序 言

法國文學無庸置疑的首席告白作家——安德烈·紀德，無疑也是本世紀堅持自傳性風格，堅持以寫作從事自我探索、自我了解最力的一位文學工作者。不論使用的是何種文學形式：故事（*récit*）、諷刺故事（*satire*）、長篇小說（「偽幣製造者」*The Counterfeiters*, 1926）、劇本、書信或者散文，他的每件作品終究是一幅自畫像，或者至少是他生命核心某些倫理問題的檢討。

從一八八九年日記開始的幾行，到一九五一年臨終六天前的絕筆，漫長的創作生涯裏，紀德始終很清楚許多二十世紀作家所指出，存在於告白文學本身的虛榮成分。紀德的深交，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 1871-1945）曾責難過他這種自我描摹的傾向。三個世紀前，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同樣以過度爲由責難了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3）。而在一些場合紀德曾公開表明他對蒙田的認同。紀德實際上剽

竊「試筆」(Les Essais)作者所使用的自我分析(他曾估計過蒙田的作品三分之一是自傳)，然後加上一份二十世紀的自覺——在他的情況裏，這意味着對心理分析的無限複雜，以及對落到他所企圖建立、有別於正統的個人道德上，種種攻擊的自覺。

十七世紀拉布利葉(Jean de la Bruyère, 1645-1696, 「人物集」(Les Caractères 的作者)的心理分析，坦誠直率，向我們清楚的描繪出人的精神面貌，但紀德認為這些心理分析，從沒有告訴我們人物如何取得他的現貌。紀德的興趣所在，他以為重要的是：多方面的力量，隱晦或明顯，如何促成了一個人的現貌。從自傳「假如一粒麥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某些直言無隱的段落，到「日記」(Journal)上一些思想行為的親暱告白，紀德在坦白的程度上無疑是超越了前行的告白作家如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柴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及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屢次強調，所以耽於此種告白性的創作，主要即在於企圖了解自己成長的律則，以及了解導致自我現狀的種種影響力。

對於梵樂希的責難傳記文學與涉及作家生平的平面資料(梵樂希曾嘲諷的說，傳記作家專門數他的傳記人物的襪子和情婦)，紀德的回答是：一個文學天才的產生，無法憑空，也絕不簡單。紀德的生平常因為生理上的某些秘密、異常，以及種種根深蒂固的不滿而顯

得隱晦不可解。當他有次說到童年的孤獨、暴躁對他產生的決定性影響（*Mon enfance solitaire et rechignée*，「我孤獨而暴躁的童年」）他暗示了我們一種可能：他的藝術成就與「生命的戲劇」將可在他的早期生活裏找到端緒。

沒有一個當代作家比紀德有更強烈的文學使命感。由青年期末到成年到老年，他把他的生命完全奉獻給文學，奉獻給表現自我的文字藝術；他將是第一個有資格宣稱：「關於人的，一切都說完了。」但他的原創性並不在於祇是表現人類的弱點與不完美；蒙田早在他以前就令人激賞地作過那樣的「表現」，所用的語言跟「日記」裏的一樣優雅、富暗示力。他的原創性毋寧在於他的信念：當有關一個人的種種都被說完了，所能了解的還是很少，或者甚至什麼也未被了解。這正是他創作的前提。肉體上的疾病、異常，以及神志失衡——這些缺點、威脅固然可以導致嚴重的不安，但久而久之，亦可以促成精神上的成長，促成一個天才所需的銳敏與領悟力。這是一個大家熟悉的論點，也正是紀德所一直堅持的：性格上或者肉體上的劣勢可以被扭轉，變成爭取優越的主動力。

紀德曾分析過一些補償作用的情形以解釋天才；這些分析尤見於他論杜思妥也夫斯基（*Fe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i, 1821-1881*）的批評文字裏。在每種改良的初期，通常有種不滿、疾病或不適應；紀德注意到聖路加（*Saint Luke*）所說的眼裏的微塵，也

注意到巴斯卡所感覺的空虛 (Pascal avait son gouffre, 「巴斯卡與他的深淵」) 以及像盧梭、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這些作家身上的錯亂症狀。個別化的私人問題可以蛻變成一種世界性的思想，也可以是使無數人受益的改良的前身。「一件藝術品可能起源於藝術家的某種病疾，一旦完成却提供了一種新的健康。這種超越性的理論（雖然很難在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印證）加上「作品展現作家的生活與性格」的信念，無疑是紀德美學裏的主要信條。紀德覺得有義務說出關於他個人的全部真理。他在法國北部南部的新教祖先，已然在他的身上注入一種對正直的嚴格要求。

在早期的一則日記裏（一八九二年一月）紀德曾談到，每個人的一生無法避免的將會用來為自己起草一幅不可磨滅的自畫像。那段年輕的日子，他有點擔憂「他」將變成什麼；他不知道自己想變成什麼。無數的可能誘引着他 (Je sens mille possibles en moi, 「我意識到一千種的可能」)；紀德決定要求自己誠實的說出真相。這種誠實對一般人也許無甚意義，但卻適用於紀德——一個在他的第一本書「凡爾德手記」(Les Cahiers d'André Valter) 誠實的分析禁慾者對生命的恐懼與愛情，在最後一本書「德賽」(Thésée) 記載經過一生的追求、自我批判終於獲得心靈的平靜的作家。

紀德的青年和成年時期正好處於歐洲文化面臨激變的年代，曾經護衛，肯定人心的傳統

力量，此時已開始崩潰。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甚至延到二十世紀，個人每每發覺自己比以前的人類要孤獨得多；道德價值和社會價值愈來愈被質疑，一些價值甚至被發現缺乏真正的意義。在二〇歲到三〇歲這段時期，紀德所經歷的「個人的危機」（這些危機曾被紀德多角度、精細的寫入他的作品）在以後的二〇年間，由於多方面的因素，慢慢的變成了一種世界性的問題。由於問題本身在於強制的道德秩序與個人的道德秩序的衝突，整個困境（dilemma）似乎找不到解決的方法。真誠的行動將指向反叛，而權威的奉行則意味著假道學。

二十世紀初期的普遍特色是對理性主義的不信任。這種情形在新一代的作家羣中尤其顯著；他們的共同點即在於：對人類知性的可信度存着一種明顯的輕蔑。面對人類問題，這些新作家（紀德是其中越來越活躍的一位）置比較古典、比較可靠的理性主義探討法（rationalistic approach）於不顧；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哲學信仰，強調一種更自然、更直接的生活，每一種事物的價值全靠它的獨特程度來衡量。基本上這正是紀德一九〇二年出版的「背德者」（*L'Immoraliste*）的中心思想。普遍的夢想和成就不再被用來衡量人類，人類的新定義在於他的原創性，他的獨立人格的特色。而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有它的真理，可察而無限珍貴。

十九世紀末葉，雷南（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和泰恩（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 的理論曾在知識份子間風行一時，但過了十九世紀後，人類對普遍的理性信心大減，取而代之的是新作家羣裏一種類乎先知的使命感。每一個作家自有他的世界，也自有一套隸屬於個人的價值觀念。「冒險」(adventure) 這個字眼——字義下包涵了種種有關「風險」「未知的世界」「異地」的暗示——變成新世紀的關鍵字之一；所意味的不只是充滿危懼，需要肉體勇敢的探險性經驗，同時更意味著種種指向藝術，指向精神的探討。它不只適於旅行到非洲或東方的人使用，同時更是宗教作家和超現實主義者的用語。冒險性的生活，不論是紀德「背德者」裏的感官享樂，馬爾侯 (André Malraux, 1901-) 「人類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 裏的戰爭經驗，或者波希夏利 (Ernest Psichari) 「百人隊隊長旅行」(*Le voyage du centurion*) 裏的宗教改宗，都意味著一種依靠直接經驗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反智識份子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無疑是傳統生活的反叛；在紀德和勞倫斯 (D. H. Lawrence, 1885-1930) 的情況裏甚至舊道德的反叛。這種崇拜冒險精神的時尚——紀德是早期的代表之一——在二十年代可清楚的見於 T. E. 勞倫斯 (T. E. Lawrence, 1888-1935，即阿拉伯的勞倫斯) 的「七智柱集」(*Seven Pillars of Wisdom*)……在三十年代則見於馬爾侯與聖德茂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 的「人之國度」(*Terre des hommes*)。

緊接著四十年代，在更深一層的哲學主張下，「冒險」被重新命名成存在主義文學的「介入」(engagement)。

隨著知識領域的擴張——尤其在實證科學方面——企圖涵蓋、同化知識的希望也跟著落空，對科學採取悲觀態度的論調變得越發明顯（至少人們已對科學知識能否引導、安慰人類，感到懷疑）十九世紀的科學方法、科學教條招致了反動，經由年輕一代作家的作品，反主知主義成了二十世紀初一股強有力的潮流，賈可·里維葉(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與亞倫·富尼葉(Alain-Fournier, 1886-1914)間的通信集便是這潮流很好的見證。在這方面，紀德一八九七年出版的「地糧」(*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強調慾望、熱情、本能等非理性的價值，是一重要作品。而先於「地糧」不久，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狂熱奔放，是一決定性的著作。再早點，一些孤立的作品如藍波(Arthur Rimband, 1854-1895)的「醉舟」(*Bateau ivre*)與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的「草葉集」(*Leaves of Grass*)都是一九〇〇年左右的生命哲學的先驅。

在這世紀的前後以及開始的兩個十年裏，新一代的知識份子紛紛對純粹的知性生活感到不滿，新生的學問如社會學、心理學，也往往受到他們的鄙視。宇宙再度變得無法理解；思

想因而分崩離析。一切都指向當代批評家所謂的「卡夫卡式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人們困惑一如迷途的小孩，不但無法了解支配他的種種力量，亦無法進行反抗。理性主義曾經是解決人類與宇宙的問題的主要方法，現在却不再得勢。宗教、科學、國族主義、有條理的心理健康——這些人類安全感的主要來源，一一受到了質疑和否定。有一段時間，人們曾經希望科學能代替宗教，創造出一套新的行為準則。這希望在十九世紀結束前後，跟著消失。「背德者」的主角米修是一個考古學家，一個科學家；他的擁抱本能，追求感官享樂，無疑正是對科學的反叛。

在個人的層面上，紀德的反叛目標在於他自己的清教背景和嚴格的宗教教育。但是在哲學的層面上，紀德在「地糧」和「背德者」二書中，所攻擊的却是哲學與宗教的「絕對」。企圖在經驗本身裏尋找到絕對，他的思想在血緣上頗近於尼采對戴奧尼索斯（Dionysos，希臘酒神）的詮釋，以及烏納木諾（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的「生命的悲劇情感」（*Tragic sentiment of life*）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一九〇七年出版的「創造進化論」（*L'Évolution créatrice*）。昂利·柏格森的哲學著作不但鑄鑄了歐洲這時期大部份的革命性觀念，而且使整個反主知主義的潮流在哲學上受到了重視。雖然否定了理智在人類生活裏的力量和可信的程度，柏格森的學說並沒有讓人類在宇宙的地

位受到損害。人類在宇宙裏出色的中心地位仍然被繼續維持，即使思想上矛盾與混亂叢生——這情形一直要延續到存在主義者把「荒謬」冠到人類的生命頭上。

由於一八九三與一八九四年的一場「個人的危機」的啓示，紀德在他的早期著作裏儼然代表了當代一種復甦的信仰：重新感受到存在與自然的神秘，渴望探索探究物質上、心理上尚待開發的廣大世界。論及生命，紀德恒以新字眼「自然的」(spontaneous)替代「知性的」(intellectual)。抽象的獨斷在他的觀念裏，恒與直接源自感官的快樂形成對立。在歐洲，前幾代的生命態度似乎一直是「判斷生活」(judging life)。紀德的新訓義却是「過自己的生活」(living one's life)。這種對感官經驗與生命神秘的新信仰，其後在D·H·勞倫斯的作品裏到處可見。而視生命為「日常的、直接的冒險」的態度，同樣亦可以拿來涵蓋一些立場較堅定的宗教作家，如克勞岱爾(Paul Claudel, 1868-1955)，斐濟(Charles Peguy, 1873-1914)——尤其當我們把眼光放在他們二十世紀初的作品上。在正統的觀點裏，直接感受生命的快樂其實就是一種神秘。尼采有名的訓義：「生存於險境」(To live dangerously)，最初被解釋成超越甚至對抗傳統道德的指示，其實正適於說明像喬治·貝那諾斯(George Bernanos, 1888-1948)與格蘭姆·葛林(Graham Greene, 1904-)所描寫的基督徒生活。人類的新目標，紀德以為，就在於溝通本身和操縱世界

的神秘力量；三十年代的貝納諾斯，從他的天主教觀點出發，對於這點看法，相信不可能跟紀德有異。

在推動反主知主義的潮流上，柏格森的哲學或者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支力量（至於紀德早期作品的貢獻，事實上比當年出版時被認定的來得大而堅實）。像「創造進化論」這樣的書，抬高「直覺」的價值而低抑「智力」的地位，在當時法國所受到年輕作家的歡迎，遠比一些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研究著作要熱烈得多。反對智力對夢想世界所作的武斷限制，柏格森釐定了人類對自己種種潛能的新態度——對冒險性存在的一種半神秘的探討與追求。這種「冒險性存在的探討與追求」無疑是二十世紀早期文學中最重要的主題。

在「地糧」，以及多年後的「新糧」（*Les Nouvelles Nourritures*），紀德先後宣告且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中心主題——這個主題在某一個意義上清楚的說明了什麼是「紀德的」（Gidian）。它似乎總是與此刻的直接經驗有關。對於此刻，此一稍縱即逝的瞬間，紀德賦予他們一種絕對的價值。這種深奧的體驗涵蓋了紀德作品裏其他的副主題：精神上的不安定，耽於感官享樂的傾向（在這方面紀德的表現比任何其他法國作家的都要來得豐富尖銳），以及被紀德提昇到美德層次的自然天性。但是這些術語並沒有一個足以說明紀德的觀點或哲學。自然的天然永遠遭受到武斷、習慣及傳統等種種勢力的迫害。在他早期與莫理斯·巴

雷斯 (Maurice Barrés, 1862-1923) 間的一場有名筆戰裏，他爲率性自然的價值作了有力的辯護。在「失根」(Les Déracinés) 這篇文章裏，巴雷斯的主要論點在於強調一個人的能力所以能發展到極致，全依靠他與他的種族，省份，家族，以及童年的習慣或熟悉景物間的一種密切聯繫。這種種對於紀德來說却意味著損害，使他的天性、能力受損的一種限制。

紀德當時是一個熱心的植物學者，慣於從薔花的實例中提出證據——譬如未經移植，一朵花的成長和美麗可能受到損害，——來支持他的看法。深植在他靈魂裏的變動不安使紀德厭惡任何來自過去，來自童年，來自家庭的糾纏力量。每種糾纏都損害到一個人面前尚待開發的未知經驗：他必須全心全意去面對的未來真實。對於紀德而言，糾纏發生的原因在於不敢接受生命的種種挑戰。因此在紀德的體系裏，渴望的經驗是最重要的——他再三的回這點上，企圖去定義它。

渴望本身是一種比渴望物的佔有更能豐富我們靈魂的經驗。紀德倡導的是，不佔有一種生命也不佔有事物的原則。一個人的靈魂必須恒常保持自由不定的狀態。人類靈魂的歷史事實上就在靈魂所能從事的種種激烈改變，以及靈魂如何被疾病，精神危機改變的深奧作用裏。這樣的信念無疑將可說明紀德對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 的厭惡，以及

他對那些持有「高乃依態度」，頑固地相信自己靈魂的恒性（constancy）與性格的果敢不屈的傢伙的嫌憎。在「新糧」的一句名言裏，紀德曾說一個人天性的最重要部份是尚未定形的那部份（*Le plus précieux de nous-même est ce qui reste informulé*）渴望的經驗因此將是生命最深刻的意義與生命最高越的價值的賦予者。

紀德對神的觀念與他的強調「此刻」，強調人類靈魂能自由接受任何經驗，有莫大的關聯。對紀德而言，達到實存的狀態，達到「此刻的充分自覺」，即等於對神的一種感知。一個人不可能了解自己，了解他心裏或這世界裏的神性，除非他能自由的體認此刻的經驗。這是追求自我認識的一個途徑，也正是「逐漸成為自己」的紀德式的歷程。